
《抗战》三日刊介绍

陈杏年

《抗战》三日刊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创办于上海的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著名刊物。它自1937年8月19日创刊,后因受上海租界当局的干扰,从9月9日第7号起至第28号曾易名为《抵抗》三日刊。11月23日第29号又恢复原名,宣布第30号起迁至汉口出版,至1938年7月7日宣告结束,历时11个月,共出版了86期。

一 上海沦陷前的《抗战》三日刊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邹韬奋由南京急忙返沪,经过连续五昼夜的紧张筹备工作,于8月19日在上海肇嘉路第75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每旬逢三、六、九日出版。邹韬奋任主编。

《抗战》三日刊在第1号中宣布,本刊的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抗战》三日刊的作者除邹韬奋外,主要撰稿人有金仲华、张仲实、胡愈之、潘汉年、钱俊瑞、冯玉祥、张志让、杜重远、章乃器、李公朴、柳湜、胡绳、宋庆龄、沈钧儒、金端苓、仲持、无患、刘良模、范长江、薛暮桥、曹聚仁、思

慕、张铁生、舒湮、王达夫、陆诒、范振兴，邹伯泳、杜若君、兹九、孟如等。

《抗战》三日刊为 16 开本，除第 1 号为 8 页外，其余均为 12 页。该刊出版周期介于日报与杂志之间，兼具新闻性与政治性。该刊辟有社论、社评、时评、短评、随笔、杂感、信箱、通讯、插画、漫画、木刻、战局一览、诗歌等栏目。其中社论、社评、时评、短评等常设栏目登载了大量的政治性文章。

上海时期的《抗战》三日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配合战局进展，及时报道抗战信息和国际动态。

《抗战》三日刊及时而详细地报道战况，评述战局的进展。该刊第一号第一篇社评，便是邹韬奋撰写的《上海抗战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抗战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事实上表现中国的确能够抵抗侵略”，它“更巩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这和民族解放的光明前途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该刊从第 1 号至第 28 号，每期均在第一页“战局一览”栏目，以大号黑体字做标题，刊载了由金仲华负责撰写的概述和评论淞沪战场、华北战场等其他地区战局的情势和得失，而且配有由著名地图专家金端苓绘制的战事地图。该刊第 12 号《华北主力战的前夜》一文，报道了我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取得抗战以来初次大捷的战况。该刊指出：“显然的，八路军游击战士已经开到晋北与晋南的主力军配合起来”，使敌人“被我首尾夹攻”。（第 13 号）我军采取的所谓“无线战略”，“不会与敌人的主力部队作正面的交锋，却会到处游击，使敌人疲于奔命”。（第 15 号）正是靠这种游击战争的展开，“晋北的危局居然被拉回转变来，其他抗战部队的战斗精神也重复加强起来”（第 16 号）该刊还详细报道了中国军队在上海的蕴藻浜、大场、宝山路等地与敌人展开血战的情况，指出：“六天六夜的血战，差不多把蕴藻浜的水都染红了。自然，这里流得最多的是侵略者的血！”（第 17 号）从 10 月 3 日的《敌军第四次总攻上海》、10 月 29 日的《我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到 11 月 19 日《我军各线后退的观察》等 11 篇通讯和评论文

章,对敌我双方于淞沪战场情况和战略战术得失,进行了报道评论。文章指出:“我军的后退,是由于敌军几次采用外线迂回战略……这是不得已的后退,在战略上并无错误;不过许多据点放弃得过速,似乎对于牵制敌后的战略,并没有经过适当的布置。”至于造成津浦线、平汉线等地后退的缺点,“简单说来,是我军的作战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是各线单独为战的,而不是使各线相互配合起来的”。(第28号)钱俊瑞发表了《抗战进入新阶段》一文,指出:“目前的抗战将从旧的军事完全失利的阶段跨出来,走向可能部分胜利的新阶段去。”“在这时候,我们一面要排击消极的悲观论者,因为悲观论者的论调正像暗底咬啮心灵的毒蛇;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指责无条件的乐观论者,因为这样的乐观论调,正像糖衣的毒药,会把中华民族在甜蜜的‘挽歌’中整个断送掉。”(第27号)

国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后,《抗战》三日刊发表了金仲华的《我首都西迁决心久战》、邹韬奋的《读国府移都宣言》两篇文章,指出:“我们深信全国同胞捧读这篇宣言,没有不感动奋发,更以赤诚拥护政府共同奋斗,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达到最后胜利。”“同时我们希望在移都继续抗战之际,对于与抗战的胜利息息相关的内政外交,尤须有迅速的刷新与转变。”(第29号)

《抗战》三日刊注重登载围绕中国抗战的外交动态和国际形势的评论文章。该刊第1号刊载了俄文每日新闻社写给宋庆龄的信《世界公敌的侵略者》,表示他们也同情我国的抗战,指出:“我们正在准备与中国携起手来,和中俄之敌人斗争。”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召开时,该刊发表了《九国公约会议之前》、《九国公约会对我们有利吗?》等文章,指出:“我们对于本月底在北京召集的九国公约会议没有过大的期望,同时我们对于它的政治结果却要严重地警戒。”(第19号)九国公约会议调解失败后,该刊随即发表了张仲实的《九国会议调解绝望以后》和王纪元的《目前外交形势的危机》两篇文章,提出:“现在我们的外交方针,不应当再是含含混混的‘循

国际和平之路线以前进’，而应当是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坚决要求各国对日寇实施制裁，并跟英美法苏四国取得密切的联络和帮助。”(第28号)

第二，宣传全面抗战，积极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救亡运动。

《抗战》三日刊刊载了多篇文章强调动员民众的重要性。如王任叔的《军政与民众》(第3号)、李公朴的《全国动员告国人书》(第18、19号)，等等。这些文章都强调指出：在国势阽危的关键时刻，纯粹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不行的，必须开放民众运动，建立各种民众组织，广泛地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使军政与民众打成一片”。该刊登载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所撰《全面抗战释》一文，指出：“所谓全面抗战，应该是指抗战的政治决心”，“在政治方面有切实的办法，必须动员全国人力(军队、人民)、财力、外交、文化(一切教育、娱乐、出版及其他宣传机关)、全中华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全民抗战。”(第3号)至于如何发动民众及组织民众的形式问题，该刊发表了胡绳的《战争时期的文化界》(第4号)、艾思奇的《文化在抗战中》(第6号)、仲持的《知识分子的当前责任》(第7号)、恽逸群的《组织农民的主要问题》(第9号)、胡子婴的《怎样动员全中国的妇女》(第12号)等文章，强调了抗战的全民性和各界民众在抗战救亡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李公朴的《救济难民工作大纲》(第20号)、中国农村经济工作研究会拟订的《非常时期乡村工作大纲草案》(第5号)、生活教育社提出的《战时教育方案》(第7号)、《上海战时普及教育服务团工作大纲》(第11号)、中国政治经济学社拟订的《战时经济计划大纲》(第10号)、章乃器的《平凡的领导与平凡的组织》(第19号)、柳诒征的《战时文化研究室工作计划大纲(草案)》(第28号)、刘良模的《抗战期中的歌咏工作大纲》(第29号)等文章，对于如何开展各方面的动员工作及发动与组织各界民众的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设计。

《抗战》三日刊对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给予了报道。9月13日，在《抵抗》第8号上刊登了《朱德等就职抗战

通电——坚决抗战众志成城》一文，声明：八路军各部队“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以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灭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该刊第20号刊登了由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于9月5日签发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介绍了陕北公学的情况和考生报考的条件；《致有志投考陕北公学的朋友们》（第25号）公开信中，介绍了赴延安去的路径和注意事项。针对国统区青年赴延安的“求学热”，邹韬奋专门写了《青年的求学狂》一文，热情赞扬了青年学生不怕艰苦、前往陕北求学的“热烈的情绪”（第25号）。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成立后，1937年9月26日，《抵抗》三日刊即刊载了宋庆龄的重要文章《国共统一运动感言》（第12号）。邹韬奋在《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一文中，强调这一事件是“全国团结御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全国忧心忧患的人们不避艰险以企求的重要主张之一”。国共这一团结，“是保障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打击！”（第12号）

《抗战》三日刊还多次登载了宣传全国抗战的精神、热情和感人事迹的文章。该刊第3号刊载了通讯《一个八岁小弟弟献银救国》，并刊登了这位名叫吴志进的小弟弟亲笔所开的题为“助银杀敌”的银器单子。9月9日，该刊第7号登载了胡子婴采访宋希濂的《战地通信》《火线的后面》，发表了宋希濂于9月5日为《抗战》三日刊题写的字：“惟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方能博取最后之胜利。”第23号又登载了王达夫采访时任东战场总指挥罗卓英的《罗将军会见记》，并刊登了罗卓英的题词：“拚血成潮，拚力成钢。地老天荒，也要抵抗。”

为了适应战事的需要，《抗战》三日刊从创刊号起即设由无患执笔的“战事常识”专栏（第2号起改为“战时常识”），介绍了有关防空、防毒、救护等方面的常识，如《从飞机谈到炸弹——怎样才能避免炸弹呢？》（第1号）、《毒气是怎样的？》（第2号）、《略谈救护》

(第3号)等等。

第三,抨击妥协论调。

《抗战》三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批判抨击妥协论调。邹韬奋撰写的随笔《战的反面》(第1号),指出:“‘和平’的本身,谁也不反对,但是丧权辱国甚至亡国灭种的‘和平’,却是我们所极端反对的”;日本所抛售的“和平的代价”和“战的反面”,是“中国的道地十足的沦亡,是四万五千万的中国人变成四万五千万的奴隶!这代价是我们所万万无法支付的”。针对九国公约会议召开之前国内所存在的妥协苟安心理,该刊发表了时评《打破妥协迷梦》和梁士纯的《辟妥协心理》一文,大声疾呼:“我们决不应存妥协的心理!”“我政府与人民应严厉拒绝敌方的任何勾引和第三国的慷人之慨的调解”(第21号),我们“要打破妥协迷梦,坚抱‘非胜利即死’的战斗精神,严厉制裁摇动人心,为敌人做清道夫的妥协论的变相汉奸!”(第19号)该刊还发表了胡愈之的《谨防疫病》一文,指出:妥协“这种疫苗在六年以来,已经散布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间”,胜利时“妥协的疫苗,只是潜伏着”,但一遭到挫败,“这疫苗就会活跃起来,弥漫在空气中间,使人们的呼吸受了窒塞”。(第15号)

《抗战》三日刊不断发表专论,抨击汪精卫之流的种种妥协投降谬论。1937年10月29日,该刊第22号在封面上用大号字刊登了一条标语:“主张妥协和平者就是汉奸”;同时,发表了潘汉年《提高民族的警觉性》(第22号)、《加强我们的团结》(第23号)两篇文章,引用了蒋介石在庐山讲过的“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和陈诚说过的“中途言和者,那真是亡国灭种的罪人”等语加以抨击。该刊第27号则发表了胡愈之的《〈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质疑》一文,指名道姓地对汪精卫散布的妥协投降论调予以痛斥。该刊连续发表了张天翼的《真假汉奸》(第4号)、孙冶方的《从汉奸之多谈到乡村工作》(第5号)、胡子婴的《防止汉奸与组织民众》(第9号)、范长江的《严重的汉奸问题》(第12号)、王而山的《特种汉奸》(信箱)(第19号)、李侠公的《肃清汉奸的根治办法》

(第21号)等文章,剖析了民族投降主义的种种表现,提出了防止汉奸,严惩和肃清汉奸的一些办法。

第四,发表通俗性的抗战文艺作品。

《抗战》三日刊多次发表了冯玉祥、沈钧儒、关露、劳荣等人的诗作,如冯玉祥的《战利品》(第9号)、《攻克敌旅司令部》(第12号)、《吴淞口大战》(第13号)、《八百好同胞》(第25号)等;沈钧儒的《敌与友》(第21号)、《十月十六日闻炮声不能成寐》(第22号)、《廿三日夜归》(第23号)等;女诗人关露的《女国民》(第3号)、《重建起自由的城堡》(第11号)等,劳荣的《黄浦江开始了咆哮》(第3号)、《全民抗战歌》(第6号)等;郭沫若、钱亦石、何香凝也分别发表了《抗战颂》(第1号)、《保卫上海》(第3号)、《赠前线将士》(第13号)等诗作,这些诗通俗易懂,简洁明快。

著名漫画家蔡若虹则多次为《抗战》三日刊作画,一些有力俏皮的画幅,既刺向日本侵略者,又撕破抗日营垒中妥协投降派的假面。木刻《同心合力扶起这倾危的十字架》(第16号),把当时中国的局势比喻为“倾危的十字架”,而把许多人手扶十字架作为各党派、各民族团结抗战的象征。《以新芽来纪念旧种》(第19号)的插画,则把日本比作是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形毛毛虫,而把中国当时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比作正在茁壮成长的“新芽”。此外,该刊还登载了陈烟桥的木刻等美术作品,以及一些抗战歌曲。

二 武汉时期的《抗战》三日刊

上海失陷后,《抗战》三日刊移至武汉,于1937年12月23日在汉口交通路63号出版了第30号,直至1938年7月3日出至86号宣告停刊。

《抗战》三日刊第30号首先登载了金仲华的《一月来战局发展的观察》一文,总结了上海陷落一个月来各战场战局发展的情况;同时,发表了邹韬奋所撰社论《怎样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指

出：“我们愿对艰苦领导抗战的蒋委员长致无上的敬意，以赤诚拥护蒋委员长继续抗战的主张”，而“根除政府和人民间的隔阂，和努力充实政府的力量，是拥护蒋委员长的抗战主张，达到最后胜利的因素”。

《抗战》三日刊从第 31 号至第 50 号继续开辟了由金仲华撰写的“战局一览”栏目（从第 51 号起改变为“战局动向”）系统报道，和评述了从上海沦陷后至武汉失陷前这段时期华北、华中及沿海沿江地区战局发展的状况，同时也配有由金端苓绘制的战事地图。该刊第 40 号登载了孟如《回民参加抗战》一文，热情赞扬了回民参加抗战的举动；第 61 号刊载了仲实《民族大团结》一文，报道了蒙藏回三族成立“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敌将士代表团”的信息。第 56 号、第 70 号、第 83 号分别登载了刘诚《谒见陈诚将军》、冰莹《白崇禧将军印象记》、臧克家《突出徐州后的李宗仁将军》三篇访问记，赞扬了这三位将军在抗战初期艰苦而又乐观的战斗精神。

该刊报道有关全面抗战的一些感人事迹。第 67 号《胡文虎先生慨捐二百万元》一文，称赞华侨巨子胡文虎“热心祖国”，“眼光远大”，为创设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慨捐 200 万元巨款，“深可敬佩”。另外，大河的《献身游击队的教授——杨秀林与太行山》（第 33 号）、刘万里的《参加抗敌决死队的十六岁女同胞》（信箱）（第 74 号）、署大同小学同学的《小朋友帮助小朋友》（信箱）（第 82 号）等文章，都以生动的事例报道了各界民众积极参加抗战的感人事迹。第 61 号登载了如心给邹韬奋的信《惟一的儿子往陕西跑去了》（信箱），说：他不赞成他的儿子往陕北跑，“中国这样大地方，需要青年工作的地方也很多，何必大家都纷纷往陕北跑呢？”

该刊大量登载了关于如何充实抗战力量和改革国民政府机构的文章。该刊从第 30 号至 86 号，每期均有邹韬奋撰写的评论当时国内外重大敏感问题的社论，其中《充实政府力量的真义》（第 31 号），《新的力量的迅速造成》（第 35 号）、《紧急加强抗战力量》（第

81号)等社论,强调要充实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社论指出:所谓“充实政府力量,”不是要握政权,也不是要想做官”,其真义在于“不仅是政府自身机构的健全与人选的适当,而全国动员所发生的伟大的力量,也就是政府力量的充实”,“其唯一的目的是加强争取抗战胜利的力量”。(第31号)该刊第62号刊载了长沙伤兵俱乐部召开的题为“怎样使官长士兵化”的座谈会纪录,指出:“官长要信任弟兄。采取民主的方式以谋改进军队的生活和任务,使每个弟兄都有权建议,好像该部队就是他自己的家庭一样。”“官长士兵化”的最基本办法,就是“平等待遇,消除官兵间的薪饷相差过远”。该刊登载的范长江的《赶紧洗刷我们不合理的政治》等文章,指出:“洗刷我们自己本身不合理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赶紧产生新的力量,是当前整个民族最迫切的课题。”我们要“迅速健全指挥战时政治之机构”,“鼓励民众之自动组织,并允许民众有为解除自己不合理负担而奋斗之自由”,“允许舆论有批评战时政治之自由”,“大批训练青年……以代替没落的官僚。”(第34号)

《抗战》三日刊借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于1938年3月9日第52号发表的社论和钱俊瑞的《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忌辰》等文章,指出:“应该集中一切力量”,“稳定目前抗战的局面”;“巩固目前的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最高度的忠实来执行中山先生的政策,消除党派之间的一切纠纷与摩擦,更进一步建立起空前巩固的全民族大联合”;“扩大三民主义的宣传,发挥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同时要加强并巩固国民党”。

1938年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抗战》三日刊发表了一组文章。第56号邹韬奋的《对国民党的恳切希望》(社论)等文章,对国民党提出了两点希望:第一,“希望国民党在实际上联系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共赴国难,而不拘泥于形式上的合并”;第二,“希望国民党在积极方面领导民众的活动而不在消极方面提防民众的活动”。接着,在第57号又发表了邹韬奋的《怎样加强国民党的力量》(社论)和金仲华的《怎样建立中国的新军》等

文章,对国民党临全大会上一些重要政策的制颁,提供了建设性意见。邹韬奋指出:“党的力量是在动员党员广泛地夹在民众中间,和民众共同努力于实际的工作,由实际的工作成绩中引起民众的信仰,也就是增强民众对于党的信仰”。“实际工作和严密监察,是加强党的力量的两个重要因素”。金仲华提出了“全民军事化”和“全土要塞化”的口号。

武汉时期,该刊继续发表文章,动员各界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该刊从第30号至第35号专门登载了钱俊瑞的《肃清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等致救亡工作同志的6封公开信,提出:“我们民众救亡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捐弃一切阶级的、党派的、乃至个人的成见,为巩固和扩大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艰苦的奋斗。”(第32号)

该刊还继续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舒湮撰写的《边区实录》,从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13个方面,对陕甘宁边区作了报道,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政绩。

该刊还载文报道中国抗战后方新疆、广西等地建设情况。第30号至第48号连载了杜重远的《到新疆去》长文,叙述了作者以一名记者的身份于1937年9月30日从上海出发赴新疆途中和到新疆后的见闻观感,全面介绍了盛世才世才的治疆政策和新疆在文化、教育、工业、交通、农牧业、林业、水利、矿业、司法、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肯定了盛世才的“执政建设之新成绩”。(第46号)第31号至第49号登载了邹韬奋撰写的《桂游回忆》,回忆上海沦陷后他1937年12月2日从香港经广西至汉口一路的观感,介绍了广西在抗战期间的建设,肯定了广西当局的“艰苦奋斗”,广西公务员的“勤奋奉公”,广西青年的“勤恳、坦白、天真、热烈、求知的迫切,爱国的真挚”,表示深信“在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上,广西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力军”。(第49号)。

《抗战》三日刊继续开展抗日宣传。该刊第31号登载了刘良模

为受伤将士而作的“锄头歌调”——《打日本歌》，歌词唱道：“拿起了枪杆打日本呀！武装了民众打日本呀！抗战到底打日本呀！打走了日本求生存呀！日本的鬼子没法儿凶呀！最后的胜利属我们呀！”《抗战》三日刊大大增加了有关国际动态的报道。第30号至86号每期均有一篇或数篇有关国际局势、中国抗战、外交和国际反侵略运动等方面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主要由邹韬奋、张仲实、金仲华、胡愈之、思慕、张铁生、孟如等人撰稿。该刊登载了《杜威等主张抵制日货宣言——陶行知先生最近由美来信》（第33号）、《想来华参加抗战工作的一个美国朋友》（第50号）、《史沫特莱在长沙》（第58号）、《欢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先生》（第58号）等文章，报道了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英、法、美、加拿大、墨西哥等国青年学生组成的世界学生代表团来华访问时，《抗战》三日刊发表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中国学联致世界学联国际学生代表团的欢迎信》和《热烈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社论）、钱俊瑞的《怎样欢迎世界学生代表》”等文章，指出：“全中国的学生、青年，全中国的人民将热诚的欢迎全世界反侵略学生青年的代表团莅临中国”。“期待着跟诸位学习与交换世界青年学生的斗争经验，这样使国际青年学生的力量与经验，结成一支巨大的队伍，打击一切反动的侵略者”。（第72号）

《抗战》三日刊载文揭露日敌侵华事实和日军厌战反战情绪等情况。张仲实的《“皇军”的“王道”》（短评），驳斥了日军经常标榜的“王道”，“替中国人民解除痛苦”是假，而“劫掠、奸淫、惨杀”是真。（第38号）此外，《美国人的反日情绪》（第31号）、《日本军阀的狂暴》（第35号）、《困难重重的日寇》（第38号）、《东京大批搜捕反战分子》（第48号）、《敌在朝鲜强征壮丁》（第46号）、《俘虏反战》（短评）（第59号）、《日军官烦闷自杀》（短评）（第64号）、《长谷川的狼狽语》（短评）（第70号）、《没落中的日本士兵与民心》（第80号）等文章，介绍和评论日军的残暴和日暮途穷的窘况。

该刊载文抨击敌人分化中国抗战营垒的阴谋。《注意敌人阴

谋》、《暴日的荒谬宣言与中国的根本觉悟》(社论),《中国只有两派》等文章,指出:“在这争取生存的抗战期中,如说中国有派的话,在实际上只有两派:一派是抗日的,还有一派是亲日的”,“现在有人叫出左派右派的口号,这是有意分化中国一致抗日的团结力量,是国人所应纠正的。”(第40号)

《抗战》三日刊还登载了一些重要文件、宣言,如军委会第六部的《吾人应有的主张和努力的途径》(第32号),《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第32号)、新华日报社、全民周刊社等38个单位的《武汉文化界为国联讨论承认义并阿事上蒋委员长及最高国防会议书》(第65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西北青年运动统一告社会人士书》(第84号)。

武汉时期《抗战》三日刊也登载了冯玉祥的一些通俗诗作,如《可爱的伤兵》(第33号)、《江苏无名老人》(第42号)、《爆竹费》(第46号)、《孩子团》(第51号)等。第41号刊载了张慧的《抗战到底》木刻作品,描绘了中国人民不畏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仍坚持抗战到底的情景。第67号登载了光未然、冼星海所作的《纪念五一节》歌曲,歌词采用男女对唱的方式,唱道:“全国工友站起来/今天是我们的五一节……”,“工人的利益莫放松/一天做工八点钟……”该号还登载了广西省政府于1938年4月17日为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庆祝99岁寿辰时,由广西摄影通讯社所摄的《九九生辰日的马相伯先生》,歌颂了马相伯的爱国精神。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